

首部《毛泽东选集》的诞生

□ 安杰

1941年至1942年间,为了适应广大党员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历史的需要,由中共中央书记处编辑,王首道、胡乔木等人参加编选,出版了大型文献集《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前者收录文件500多件,后者收录近200件。1943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又编辑出版了上、下两册的《两条路线》。这3部大型文献集的面世,对当时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对帮助党员干部、理论工作者了解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充分认识党的斗争历史,具有重大作用。特别是《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这两部文集,收入毛泽东已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的文章、讲话以及签发的文告上百件,为有关部门编辑《毛泽东选集》提供了有利条件。

1944年1月10日,党中央在对晋察冀分局干部扩大会议的指示中提出,要在干部中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建设正确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达到统一党的思想”。晋察冀分局负责人聂荣臻、程子华、刘澜涛等在报告和讲话中,强调要广泛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中央晋察冀分局委员、分局宣传部部长胡锡奎主持制定的《1944年宣传工作方针与任务的指示》特别指出:“在党内外广泛深入地宣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使全党彻底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全党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同志思想的指

导之下,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与此同时,晋察冀分局决定编辑出版一部《毛泽东选集》。编辑计划很快制订并报告以毛泽东为书记、王稼祥为副书长的中央宣传委员会以及中央宣传部,获王稼祥批准。

《毛泽东选集》的具体编辑工作由晋察冀日报社主编邓拓负责,“编者的话”一文就是他起草并经晋察冀分局有关负责人审定的,其精神与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有关“毛泽东思想”的论述一脉相承。5月初,邓拓工作调动后胡锡奎兼任社长一职,主持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前未完成的具体工作,对有关篇目进行增补调换,排版、校对、印刷直到印出样书。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在经济、军事的重重封锁下,物资供应成了最大难题,连印刷用的白纸都难以买到。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节约物资,晋察冀日报社自行造纸印报,省出白纸印《毛泽东选集》。为了不出错误,保证印刷质量,从排字、打纸型,到垫铅板、印刷,再到装订,各个环节的工作人员都付出了最大的努力。

1944年7月,首部《毛泽东选集》由晋察冀新华书店发行,和边区广大人民见面。初版主要编入毛泽东从抗战以来到1944年6月间的29篇著作,约46万字,共5卷,印有精、平装两种,精装一册合订,平装分5册装订。其中平装本分为5册,小32

开,785页,印数2500册,封面所印“毛泽东选集”及卷号为红字,书名页题名及下方“晋察冀日报社编”为黑字,扉页印毛泽东免冠肖像一幅。精装本为合订本,由红缎、蓝缎作书皮,“毛泽东选集”字样为金字印刷,印数同样是2500册。在当时的环境下,该版《毛泽东选集》在编排上还是比较系统而完整的。在体例上,成书肖像后面依次是扉页、版权页、编者的话、总目录。在编排上,按照内容共分为五个分卷,第一卷包括《新民主主义论》等5篇著作,为国家与革命问题的论著;第二卷收录《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等11篇,为统一战线问题的论著;第三卷收录《论持久战》等3篇,为战争与军事问题的论著;第四卷收录《论合作社》等3篇,为财政经济问题的论著;第五卷收录《反对党八股》等7篇,为党的建设问题的论著。该版《毛泽东选集》的版权页上,标注的时间为1944年5月,实际上5月是发稿付排时间。在付排前,临时补充了6月份发表的《同中外记者团的谈话》,但版权页未变更。

这部《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翻开了毛泽东著作出版史上新的一页,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提供了最早的参照蓝本,对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国革命史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1938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原貌

中共创办的第一所艺术学院

□ 周文洋

1937年,中国共产党发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救亡”的号召,大批进步青年满怀爱国激情和革命理想,迢迢远途来到延安。

抵达延安的人员中,有许多人热衷文学艺术,他们若发挥特长为抗战服务,还需学习、培训。中共中央也认识到:文学艺术是宣传、鼓动、组织团结抗战的有力武器,是对敌斗争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培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艺术团队,是当前的紧迫工作。

1938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筹建一所艺术院校。经一段时间的学员考核、教师聘任、校务准备等,同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在延安挂牌,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艺术学院。

“鲁艺”以“团结与培养文学艺术专门人才,致力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为办学方针,设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系等。茅盾、艾青、华君武、吕驥等60多位文学艺术家陆续加入教师行列。蓝天野、贺敬之、郑律成、于蓝等200多名思想进步、富有潜力的文艺青年先后进入各系学习。

“鲁艺”以培养抗战需要、服务人民的文艺精英为己任,对学科、课程、创作等都大力提倡革命化、民族化、大众化。如美术系开设民间、民族艺术选修课,学员们创作出大量富于地域特色、生活气息浓郁的木刻、年画、连环画等。学员王绪阳创作的连环画《我要读书》《童工》等,生动塑造出感人的艺术形象;学员们创作的木刻《民兵》《军民合作》,年画《五谷丰登》《保卫家乡》等深受广大群众喜爱。

1938年11月,冼星海来“鲁艺”音乐系任教并创作出《黄河大合唱》。在1939年5月11日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音乐会上,他指挥百人团队演出慷慨激昂、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毛泽东看后连赞“好、好、好!”周恩来也题词道:“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从此,延安成了红色歌咏中心,“鲁艺”演唱的歌曲会迅速传遍各地,成为凝聚民心、激励斗志、团结抗战的精神动力。

“鲁艺”在提倡实用艺术教育的同时,将政治、时事、形势教育作为重中之重,学院设立政教处,把刘少奇、李富春、李卓然等人撰写的《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等做为政治必修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经常应邀来“鲁艺”作政治报告,讲时局形势,让学员在增长文艺才干的同时,提升政治素质和思想觉悟。

当时,“鲁艺”的教学条件十分简陋、艰苦,曾任美术教师的蔡若虹回忆说:“吃的是粗糙的小米,穿的是旧衣草鞋,住的是潮湿的窑洞,但师生们的精神状态却非常乐观。”

1939年2月,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鲁艺”师生积极响应,把生产劳动与体育课、实习课结合,各系每周安排2天劳动时间,休息时开展访谈、写生等活动,让学员不但有了与群众交流、体验生活的机会,也使体能和思想得到了磨炼。

自此,“鲁艺”不断组织师生深入生活,挖掘素材,坚持文学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针,创作、上演、展览、出版了大量丰富多彩的文艺力作,如:歌剧《白毛女》《兄妹开荒》《亡国恨》;版画《大生产》《群英会》《军民打成一片》;歌曲《南泥湾》《游击队歌》《到敌人后方去》以及《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等一大批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经典作品。

·丝路文史·

甘肃汉简——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文化宝藏

□ 杨为民

秋意渐爽时节,位于兰州西津西路上兰州老街文化景区的甘肃简牍博物馆即将开馆。有文旅专家评价,随着近年国民文旅热高潮迭起,甘肃简牍博物馆以其别具珍稀特色,必将成为“如意甘肃”、金城兰州的又一文化名片,惊艳游人学者。

甘肃是简牍大省,自1907年以来,共出土简牍8万余枚,其中汉简7万余枚,占到全国的82%。改革开放以来至今,在几代文物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和不懈努力下,甘肃简牍的研究保护挖掘,成果丰厚,始终在全国该领域名列前茅。2007年,“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成立,甘肃的秦汉简牍有了专门的研究保护机构。甘肃第一次出土汉简是在1906年至1908年间,进入敦煌盗宝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敦煌西北汉长城烽燧遗址盗掘汉简。1930年至1931年,中国、瑞典学者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在甘肃、内蒙古境内的额济纳河两岸和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东南的汉代边塞遗址里发现1万枚左右汉简。1944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组成西北科学考察团,对敦煌小方盘城以东的汉代烽燧遗址进行挖掘,发现汉简43枚,还包括戍卒名籍、器物簿籍、邮书簿籍、文书、信札等。1959年7月,甘肃博物馆在武威城南15公里之磨嘴子第6号汉墓,发掘出土简本《仪礼》,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敦煌马圈湾遗址出土汉木简1217枚,对争论不休的玉门关位置有了新的佐证。柏树滩早坡出土《汉代医简》,是迄今发现的我国医学著作的最早的原始文物。1990年在敦煌悬泉还出土了近两万枚汉简等等。

相对迄今甘肃珍藏的数量近十万枚简牍,在即将开馆的甘肃简牍博物馆亮相的甘肃简牍还只

是游人眼中的惊鸿一瞥。从事甘肃简牍整理研究挖掘近40年的考古学家、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图书资料室主任、研究员张俊民先生介绍说:“甘肃不仅是最早发现汉简的地方,出土汉简数量也最多。而且甘肃汉简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多个方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文献历史的重要补充,更是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文化宝藏。”

张俊民曾参加悬泉汉简的发掘、整理,尤对于悬泉汉简的研究工作一干就是二十多年,他介绍说:“悬泉简发现是非常偶然的,当时养路道班的工作人员去拉生活用水,就发现山坡上有不少的汉简,但直到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才开始抢救性发掘。悬泉是我国汉简的十大发现之一,3年里发掘了4次,我参加了两次。记得当年知道我能到现场亲手发掘汉简真是非常激动,晚上都睡不着。到了悬泉我在圪梁上看到很多汉简就露在外面,随手就能抽出。记得那时白天发掘,晚上要将发掘出的汉简移交管理,有的汉简字迹非常清楚,跟新写的一样,我们就开玩笑说是谁新写了埋进去的。”

悬泉汉简的出土,研究对当时的历史文献有巨大的补充作用,如当时的地方建制情况、物价情况、屯田情况、地名等等,这些在文献中是很少记载的,但汉简中却记载得非常详细。在张俊民的研究中,很多研究成果都非常宝贵,如《骑置册》和《鼓令册》的研究。张俊民说:“《骑置册》在悬泉汉简的近两万枚中仅有4枚,它告诉我们从长安到敦煌之间一共有多少置(驿站),这些置分为几个等级,有哪些职能等等。而《鼓令册》也仅发现5枚,它告诉我们在当时的置中是如何接待



官员的,就是根据所接待官员官阶的不同,以击鼓次数为依据进行接待。在置中工作的人员一听击了几下鼓,就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规格来接待。”

据张俊民介绍,随着科技的进步,对于汉简的辨识早已有了更加科学的方法,如红外线等高科技的运用,这使得以往靠肉眼和放大镜无法看清的字已经能够辨识的更多。然而,由于条件所限,甘肃出土的数量巨大的汉简,能够整理成册的也就是其中字迹清晰的汉简,数量并不多。希冀在建立文化大省、强省的路上,搭上智能科技进步的快车,对甘肃汉简——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文化宝藏,有更大的挖掘和发现,为丰厚中华文明历史文化宝库,作出更大的贡献。

据悉,作为一座向公众展示简牍文化,解析简牍故事的博物馆,甘肃简牍博物馆力求通过声、光、电与场景相结合的方式,将简牍中描写的人物、事件更加直接展示出来,带领观众沉浸式读简,感受昔日秦时的明月,汉风丝路的古韵。

碧口镇

·丝路览胜·

茶马古道上的陇南名镇

□ 谭昌吉

碧口,甘肃四大名镇之首,陇上文化、交通、商贸的“窗口”;碧口,文县繁荣发达史的佐证;碧口,千年历史人文的“经典”。

碧口,古称碧峪,现名碧口镇,位于文县县城东部白龙江下游碧口镇境内。碧峪之水从崇山峻岭而来,透如玉绿如翠,故称碧水沟,简称碧沟或碧峪,现称碧峰沟。它的出口处流速缓慢形成沙滩,取名碧口坝,人们在此开发建房,修街经商,发展成为甘肃的历史名镇。

三千多年前,碧口已有类活动。在此出土过石斧和化石。据《汉书》记载,碧口“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近年又在碧口镇响浪行政村发掘了大量汉代墓葬,出土了成批的古铜器等。

三国时,白龙江、白水江流域和阴平、阳平都是曹魏与蜀汉政权争战之地。阴平太守廖化、守将郭淮屯兵据守于此,姜维、邓艾争战于斯。邓艾涉险登山,行七百里无人之地,翻越摩天岭,灭蜀的历史事件,成为“邓艾伐蜀”历史典故。今仍有邓艾城、姜维城、郭淮城等遗址。

碧口是史称“秦蜀锁钥”的重要关隘。有诗为证:“天开一堑锁咽喉,控制西南二百州。御寇有方泥不清,重门无警抑常收。”(明·张其光《玉垒



关》)古阴平桥也建于此,南宋伟大诗人陆游作《老学庵笔记》于此。

清康熙乾世之后,碧口日趋繁荣,并在碧口设立甘肃肃州碧口分局;其征银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为17100两;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为18688两;宣統元年(1909年)为18101两;宣統二年

组,船只30多艘。江西、四川、陕西等旅居碧口的富商增多,船工等组织起各自的“会馆”,并大兴土木建设庙宇、官殿,一时馆所林立。最早的是船工的鲁班庙,最大最雄伟的是由碧口镇本地船商与重庆、武汉庄客组织修建的紫云官“王爷庙”,规模居西北之首。碧口镇教育事业也发达起来,出现了大学生和女洋学生出入。

辛亥革命之时,碧口民众砸烂了“厘税局”。1935年4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中,担任主攻任务的红三十军、三十一军通过青川,开始向摩天岭进发,准备北进文县,进而攻占天水,夺取甘肃南部,实施创建四川、陕西、甘肃新苏区计划。另外红三十九军八十九师和三十一军部分向青川、平武挺进,以切断广元与江油国民党守军的联系,相机夺取碧口,扩大陕甘边区。这次军事行动中,在碧口一带受到了国民党胡宗南部的重兵阻击,红军英勇不屈,浴血奋战,发动了“血战悬马关”“平台山之战”“激战摩天岭”,战斗进行了18天,称为红军史上的“摩天岭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甘川公路的修通,古镇显得更有朝气,繁荣昌盛。20世纪70年代在白龙江干流上建造的碧口水电站,装机30万千瓦,年发电量14.63亿度;又为碧口增添湖光山色,2006年,碧口镇被评为甘肃省首批历史文化名镇。(二)